

目的王国：康德思想对当代社会的适用性和必要性

侯苏桐

浙江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发布日期：2025年9月23日

摘要

在当今世界的“后现代性”状态与背景中，反规范性、去中心化的社会运动和思想转变愈演愈烈，道德相对主义泛滥，“取消文化”趋势增长等一系列，意义私有化和元叙事失效成了我们这个时代不得不去面对的独特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环境中，当今社会分化出了两种极端的思想——即完全放弃社会责任的原子化的个人主义和将“为了大多数而牺牲少数”正当化的整体主义。本研究的目的并非支持这两个极端中的任意一端，而是主张从后形而上学意义上重新诠释康德思想，把“定言令式”与“目的王国”转译为可操作的最低公共伦理，并提出三条制度化判据——（1）普遍化检验 / 可共立法性：拟制的一般规则能否被所有人一致采纳而不自我矛盾或摧毁其前提；（2）人格尊严不可物化与替代：任何个体不得仅作手段，且须证明无更温和替代；（3）相互立法与可公开辩护：相关者拥有知情、申辩、救济与审计的程序性权能。

关键词

后现代社会；康德思想；目的王国；定言令式；普遍化检验；人格尊严

The Kingdom of Ends: On the Applicability and Necessity of Kant's Philosophy for Contemporary Society

SuTong Hou

The Institute of State Governance,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dition and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postmodernity, anti-normative, decentering social movements and shifts in thought have intensified; moral relativism has proliferated, and the rise of “cancel culture,” among other trends, has produced the privatization of meaning and the breakdown of metanarratives—phenomena our era can hardly avoid confronting. In this envi-

文章引用：侯苏桐. (2025). 目的王国：康德思想对当代社会的适用性和必要性. 文史哲论丛, 1(2), 18–24. ISSN Print: 3079-5400; ISSN Online: 3079-5419.
DOI: 10.63313/LHP.2002

ronment, two extremes have taken shape: an atomized individualism that abdicate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a collectivism that seeks to justify “sacrificing the few for the many.” This study endorses neither pole. Instead, it advocates a post-metaphysical reinterpretation of Kant, translating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and the Kingdom of Ends into an operational minimal public ethic, articulated through three institutionalized criteria: (1) universalizability/co-legislatability—whether a proposed general rule could be adopted by all without contradiction or the destruction of its own preconditions; (2) non-objectification and non-substitutability of human dignity—no individual may be treated merely as a means, and any restriction must pass a least-restrictive alternative test; and (3) mutual legislation and public justifiability—affected parties must hold procedural powers of information, contestation, remedy, and audit.

Keywords

Postmodern Society; Kantian Thought; Kingdom of Ends; Categorical Imperative; Universalizability Test; Human Dignity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Erytis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自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等一系列历史变革改变了人类一千多年来的生产关系起，社会从前现代转变为现代，随之而来的人权斗争从未停止，从政教分离到劳工革命，从女权运动到酷儿平权，社会以不断打破与重写规则为特征，要求我们以新的正当性来评估旧秩序。如今随着这一历史进程的持续推进，我们已经进入一种可称为后现代性的处境——即宏大叙事退位，合法化不再来自单一源头，社会的去中心化成为常态。我们正在面对一种几乎前所未有的激烈矛盾——价值与权威的碎裂、群体之间的相互不信任、紧急状态话语与日常规则的频繁冲突。在这样的世界里，如何在不选择消极倒退的前提下，仍然维持可公开辩护的最低公共伦理，成为今日政治—伦理讨论无法回避的问题。

2. 原子化个人主义的谱系与现实：从道德相对主义到情感空心化

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在他的《后现代状况》中指出，后现代的标志是对“元叙事”的不信任。以此标准来看，我们毫无疑问正处于一个后现代的社会，合法性来源从单一中心转入多元竞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单一“总叙事”的怀疑加剧、对统一合法化的标准难以与他们的父辈达成共识。这种怀疑并未产生一个更稳固的公共基础，反而与技术—经济结构的快速变迁相互强化：社会“去中心化”、规则的可替代与可撤回日益常态化，道德与伦理判断陷入相对主义、信任的衰减与情感连接的脆弱，使我们在享受权利扩张的同时，也面对前所未有的社会张力与日常层面的失序体验。

当今的技术产品，从投入研发到产出并流入市场的速度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快，大数据平台将“私人经验”数据化与商品化，人的工具化倾向加剧，个体尊严被瓦解，社会变化与人们生活的步伐彼此竞速，公共同步能力下降，个体在这种充满刺激的环境中愈发难以维持稳定承诺与可预期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义务、承诺与信任，正逐渐沦为临时、可撤销与可替代的“选项”，传统的社会价值观若不能与当代的生产关系结合，就会变成一种使人感到压迫的落后意识形态，于是，一种以“去关系化的自利

最大化”为特征的原子化个人主义兴起了。

原子化个人主义并非只是一种心理状态，当人群中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关心其他任何同胞的利益，社会资本下降又恰好与流量至上的结构相遇时，我们就不得不承担公共生活呈现三重退化的后果。第一、承诺脆弱化。即长期组织的吸纳力下降，短期、一次性的连接成为主流。第二、互信稀薄化。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更依赖“即时激励—算法撮合”，较少依赖“名誉—传统—互惠”的慢变量。第三、冲突叙事化。保守主义与进步主义越来越难以在共同实践与程序中磨合，而只能通过标签选择性叙事互相煽动对立，激化矛盾。这三重退化为“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崩坏”提供了社会学意义上的解释框架。

这种道德崩坏无处不表现在现实层面。在过去，尊老爱幼是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鲜少有人质疑这一约定俗成的标准，但在互联网上却充斥着对“熊孩子”和“变老的坏人”的声讨。无独有偶，在美国，根据皮尤 2023 - 2024 年的大型调查显示，18 - 24 岁人群中，无宗教信仰者达到了 43%，而 74 岁及以上人群无宗教仅 13%，代际差异显著，在同一份调查也显示，即使在基督徒当中，年轻人也倾向于用自由主义来解释他们的信仰，而非坚持基督教的传统教义和伦理要求。这些现象在对传统价值观造成冲击和挑战的同时，也引发人们重新思考，道德或许确实并非客观的、绝对的存在。

从规范哲学角度看，道德崩坏不等同于个体“道德水平下降”的心理归因，它更像是一种结构性的“道德相对主义”被默认的社会逻辑。伊努曼尔·康德毕生所强调的“定言令式”，即“人永远只能作为目的而不能是手段”的原则似乎在当今社会失去了效果，当合作前提从“我们这个集体在一起的长期性”转入“我个人在此刻的得失”时，“以他者为手段”的行为更具合理外观，而“以他者为目的”的实践更显成本高昂。信任、承诺、共识与怜悯等传统德性，不再拥有足够的制度与媒介支撑；它们从“社会共识”退化为了“奢侈品”。

原子化个人主义带来的不仅是旧道德的崩坏，也制造了更多情感淡漠和孤独，数字媒介的发达以“无处不在的连接”制造了关系的拟真，我们能够更频繁地接触彼此，却更难以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中维持互为目的的态度。全球公共机构已经把“社会孤独/连接缺失”视为公共健康议题：世卫组织和多国公共卫生部门指出，约每六人中就有一人经历孤独，且其风险对身心健康与寿命具有可测量的负面影响，这一流行在青年群体中尤为明显。社会学家雪莉·特克尔对这一现象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技术承诺更多连接，但也让我们“期待从技术获得更多，从彼此身上获得更少”。由此可见，那些秉持选择“精致的利己主义”的个体并没有因不再承担任何责任而变得幸福，反而在更加渴望被理解和亲密关系当中迷失。

原子化的个人主义在后现代的生成与扩散，以及随之衍生的一系列问题，归根结底是旧秩序被摧毁而新秩序尚未建立造成的，媒介—技术的发展无法等待人类集体的价值观重塑，这种错位造成了人的物化、关系的工具化与情感连接的失效。因此，若不能在后现代处境中重建最低公共伦理，以抵消原子化与牺牲逻辑的合谋，对当代的道德失序和情感断裂加以纠偏，我们就永远无法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但我们对后现代社会的矫正是否要以机械地回归总体主义为方式？在下一章中，笔者将着重探讨这一点。

3. “牺牲的安全感”：从纳粹式总体主义到当代东方科幻的集体主义回潮

笔者在上一章已经指出，当代社会中，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信任的流失与孤独流行相互叠加，正在摧毁我们的世界，然而与之相反的，这一切又催生出另外一种典型的心理反应：为对抗不确定与失重，人们转而向能够迅速提供意义与秩序的“整体”寻求庇护。汉娜·阿伦特早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就提醒我们：“在非总体主义社会中，为总体统治做准备的，正是孤独从边缘体验转为日常经验。”与此呼应，埃里希·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同样揭示了现代人面对自由的风险与责任时的“逃避机制”，即当个体无法承受自由的负担时，便会倾向把自我交付给更高权威，以换取确定感与归属感。

这种“为获得安全而回到整体”的逻辑并不止于心理层面，它会在政治与叙事层面常表现为以“大

义”“共同命运”之名，要求个体让渡原则性权利，乃至把特定的人或群体视作可替代的牺牲品。20 世纪上半叶的纳粹德国已经提供了一个历史图像，而在 21 世纪的意识形态当中，类似的“牺牲叙事”也时常以灾难大片与科幻史诗的形式回潮。

纳粹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威权主义”，而是力图以“人民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重铸一个以种族—国家为终极单位、个体从属于整体的政治伦理秩序：国家存在为“民族/人民（*Volk*）”服务，真理与道德以是否有利于“民族保存”为准。这套话语以高度动员的情感共同体替代多元社会的利益与程序，不在场者与“不合标准者”被排斥、隔离，以至物理性消灭。多项学术研究亦指出，纳粹宣传将“人民共同体”塑造成最重要的社会概念，用以规范个人的自我理解并正当化其从属性；在实践上，它与一整套组织—仪式及暴力技术一体运作。

我们对于纳粹德国，并不能只停留在历史指责的态度，而要从结构层面进行反思与洞见：当社会处于原子化与孤独的张力中，“以牺牲换取秩序”的方案为何具有吸引力。这类“总叙事”如何把紧急状态、极端环境这类及其边缘的例外常态化，从而侵蚀个体的不可替代性与程序性尊严。这一洞见，恰是我们思考与分析当代意识形态时的参照面。

与 20 世纪的欧洲不同，21 世纪的中文文化工业拥有强大的类型片生产—分发能力与稳固的集体记忆与家国叙事传统，这使得“牺牲叙事”的美学资源尤其充足。同时，地缘政治竞争与技术民族主义的兴起，也为“集体动员—共同存续”的想象提供了语境。在下文的讨论中，笔者以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两部作品作为例子，在此，笔者将仅仅探讨文本与其叙事价值，并非对现实政治的简单投射。作为审美对象，灾难与科幻类型片擅长以极端处境压缩道德张力，因而天然成为检验“牺牲叙事”边界的“直觉泵”。在近年来的中文科幻样本里，《流浪地球》系列与《三体》三部曲尤其具有代表性：前者以“集体动员—共同存续”为叙事核心，后者在“黑暗森林”的宇宙政治学中反复演示“生存高于一切”的威慑伦理。

从文本层面看，《流浪地球》（2019）与《流浪地球 2》（2023）将“集体行动”与“牺牲伦理”塑造成价值高点：多重人物线索均以“为地球/为人类”的抉择收束，个人亲情与生命在关键节点被置换为对共同体的承诺。这一取向在跨文化评论中常被概括为“拥抱集体主义与结果主义”。多篇学术与会议论文也从“价值观传播”“国家形象与软实力”出发，明确将“牺牲—集体—责任”识别为《流浪地球》的核心母题之一，甚至在大众媒体的评论里，也不乏“危机时刻，集体行动高于个体自由”的公开表述。

当然，影片在叙事层面也交织了家庭伦理与情感救赎，但其价值排序并不隐晦，当人类文明的整体存续与个体权利、亲密关系以及一切人性当中的爱与美发生冲突时，前者具有压倒性优先级；牺牲被正当化为崇高，乃至成为跨代继承的伦理美德。这样的文本机制，提供了观察“牺牲的安全感如何被激活与正当化”的窗口。

小说《三体》三部曲则以更“硬核”的宇宙政治学角度推动叙事：从“黑暗森林”假说到“威慑纪元”，作品建立了“相互毁灭的可置信威慑”这一终极秩序，并以“执剑人”制度把“按下按钮”的决定权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威慑秩序依赖一名“执剑人”对两族共同毁灭之威胁保持足够概率的可信实施，并以此稳定宇宙均衡；该机制在三部曲终篇（《死神永生》）的关键情节中更迭，引发文明命运巨震。学术讨论指出，所谓“黑暗森林的伦理”实质上将“生存”确立为压倒性价值，其他道德考量作为次要甚至可牺牲项退居其次。

若以“牺牲逻辑”的角度看，《三体》呈现了比《流浪地球》更为彻底的“可替代性制度化”，即个体、群体乃至整个文明都可能成为威慑策略中的变量，伦理困境被转换为概率—博弈问题，而非以“不

可替代的人”作为第一约束，在关键节点上，程序与同意的地位被“战略必要性”“技术理性”所覆盖。这并非对作品的否定性判决，而是指出其伦理实验的锋利——它将“牺牲的安全感”推至极致，要求读者面对为了存续我们愿意牺牲什么这一古老但尖锐的问题。

从阿伦特与弗洛姆的脉络回看，上述文本之所以具有强烈吸引力，是因为它们在原子化—孤独—不确定的背景下提供了三种即时满足，而这三种满足也携带着风险。第一、意义的归一化。即把多元冲突压缩为“生存/存续”的单一指标，回避复杂判断负担，而当“生存”“大义”被设为终极目的时，最先退场的往往是“把人作为目的本身”的约束，个体被降格为变量。第二、情感的团结化。即通过震撼的牺牲场景与“共同命运”的叙事，迅速生成“我们”的情感。整个社会将集体认同“紧急状态—必要性”的优先性，从而遗忘在一个常态社会中的伦理标准。第三、行动的简化。在这样的社会中，以高度集中化的执行理性替代分散的公共程序因为有着极高的效率而成为必然，这就会导致叙事盖过程序的非理性，例如，当你反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价值导向时，你就会被指责为“不合群”“不懂科学”“不顾人类大局”。历史图像已经不止一次地提示我们，当这种逻辑与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的组织力合流，“安全感”会与排斥、隔离甚至暴力纠缠不清。

需要公平承认的是，在灾难叙事中，任何社会都可能强调“集体行动”。但理论上，我们仍须区分两种路径，它们分别是程序化集体行动和叙事化集体动员。前者以公开辩护与权利约束形成的“临时例外”，保留个体不可替代性与事后追责，后者以“大义—必要性”为理由压倒权利与程序，把“为多数而牺牲少数”常态化、正当化。

《流浪地球》的成功在于它提供了合目的性的情感结构：牺牲—团结—胜利的闭环让观众在不确定时代获得情感秩序；但它也因此天然面临一个规范问题：当牺牲被美学化、当“必要性”成为万能通行证，我们如何确保它不会外溢为日常治理的默认逻辑？答案只能来自程序而非更强烈的叙事。《三体》的锋利之处在于，它把上述问题推向极致并迫使我们正视。当生存被绝对化时，道德约束如何不被吞噬？“执剑人”制度将“一人之手可定两族存亡”的难题暴露无遗：如果没有可公开辩护与可复原的监督，此制度在美学上虽有张力，在规范上却难以通过底线测试。

“牺牲的安全感”在原子化焦虑中很容易获得吸引力，并以纳粹“人民共同体”的历史图像与当代东方科幻的两部代表作为镜，呈现其动员效率与规范风险的两面性，一面是迅速达成的情感团结与行动一致，另一面是对不可替代的人与公共程序的结构性的压低。阿伦特与弗洛姆的洞见提示我们，孤独与不安全感会为总体主义式的承诺开路，历史经验与文本实验也同样提醒我们，没有底线的牺牲终将反噬共同体自身。如何在这样的社会里重新建设规范，既不滑向犬儒主义与虚无主义，也不转而投向多数人的暴政？笔者认为，若以康德“定言令式/目的王国”为标准，构成一套最低的公共伦理秩序，既能承认危机中的效率诉求，又能守住普遍化、尊严、相互立法的底线。这将在下一章被详细讨论。

4. 康德式“最低公共伦理”：从定言令式到“目的王国”的三条判据

在前两章中，我们已经看到现代社会中两端的失衡，一端是原子化的相对主义，侵蚀承诺与互信；另一端是以“共同存续/大义”为名的牺牲叙事，将个体降格为可替代的变量。著名哲学家康德曾提出定言令式为实践理性之最高原则，要求任何行动原则（maxim）必须可作为无条件的、对一切理性存在者有效的规范根基。因此，要在不盲目退回传统的前提下重建公共底线，本文主张对康德伦理作“后形而上学”的重述，以定言令式的三种表述——普遍化（第一公式）、人格尊严/人性（第二公式）与目的王国/相互立法（第三公式）——也是作为最低公共伦理的三条判据。

此处的“普遍性”并非宏大叙事式的历史目的论，而是程序化的普遍化检验，即当一个人愿意据以行动的准则时，能否无矛盾地被所有人同时采纳。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第二章中给出著名表述：

“只按照那样的准则行动：你同时也能愿意它成为普遍法则。”这一定言令式的普遍化公式，意在排除那些一经普遍采纳即自我矛盾或摧毁其生效前提的行为准则（例如普遍说谎将摧毁承诺与信任的语义前提）。换句话说，就是当我们要做出一个行为或讨论一个政策的时候，应当设想其被所有人采纳，审查是否会产生自我矛盾、语意前提崩塌，例如当你认为谎言可行的时候，要先思考“如果人人都抱有谎言无伤大雅的想法，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同时检验该准则是否以自身之实施破坏其可实施性，例如宽容那些不宽容的价值观与行为，就会破坏宽容本身（宽容悖论）。

“人格尊严”也并非抽象敬辞，而是对“把他者仅仅当作手段”的禁止。在康德的同一著作当中，他这样描述人性公式要求：“如此行动：把人性，无论是在你自己身上还是在任何别人身上，总是同时当作目的，而决不只是当作手段。”学术界对此的解读也很鲜明，把他者仅仅当作手段是道德上不可许可的。任何决策不得预设“某些具体的人或某一群体可作为可牺牲的变量”，例如在电车难题中，选择“拉下拉杆，因为一个人的死亡好过五个人的死亡”，就是严重违背了将人视作目的而非手段的原则。若为公共目的必须采取限制或伤害性手段，须证明不存在更温和的替代，并保留退出、申辩和补救的路径。在当代伦理中，奥尼尔沿此路向强调欺骗或强迫会使真实同意不可能，从而构成对“作为人”的否定，这为“反工具化”的制度含义提供了清晰坐标。

“目的王国”则把个体视为共同立法者，要求一切影响基本自由的规则具备可公开辩护性。这是康德对第三公式的系统化阐明：“依照一个仅仅可能的目的王国中立法成员的准则去行动。”其旨趣在于把每个行动者同时视为立法者与服从者，强调只有那些能在一个由理性者共同立法的制度中可公开辩护的准则，才具有道德正当性。这一点在学界通常被理解为将前两公式推进到共同体与制度层面的要求。

“目的王国”强调程序性尊严，即相关者拥有知情—申辩—救济—审计的制度化位置，决策理由须可面向大众解释，而非仅凭技术性或叙事性诉求排除反方。

我们以三判据的标准再来看后现代社会的两极化。原子化个人主义把“自由”窄化为不受干预，忽视“能与他人共立法”这一积极向度。依判据一，像“无视承诺以即时利益为准”的行为准则一经普遍化，即自我取消；依判据二，算法时代的关系工具化应受“不可替代性”与“最小限制性”约束；依判据三，平台治理应将用户与劳动者作为“制度中的立法成员”，提供可公开辩护与救济的程序。如此，“自由”被还原为自律与共律，而非任性。

面对“以生存为名的一切皆可牺牲”，判据二首先给出红线：即便在危机中，把具体的人仅作为手段也不可许可；判据一要求检验“例外规则”的长期可普遍化（若例外常态化，则摧毁法治与信任的前提）；判据三要求任何“必要性”都须经过可公开辩护的程序而非由叙事压倒。对第三公式的解读正强调此点：作为“目的王国”的成员，我们以立法者的身份评估规范是否能被所有理性者所共同接受。

5. 对反对意见的回应与小结

当我们提倡以康德“定言令式”来为社会守住底线，接受旧秩序已经被打破的事实，但又不陷入将一切都视为相对主义的深渊时，这一套流程必然会经来自两方的质疑，下面笔者将列举一些常见的反对声音以及回应。

反对一、定言令式过于形式，给不出具体答案。

回应：三判据并不提供具体的“最佳方案”，而是提供可证伪的底线，一种思路。它们排除自我矛盾的规则、工具化的手段与无程序的例外，从而在“多元但要共生”的社会里收束决策空间。此概述亦指出，康德的道德要求是以实践理性的无条件性来约束，而非为每一争议议题给出具体政策。

反对二、危机中不能拘泥程序，必须算总效用。

回应：判据三并不否认例外与效率，而是要求例外的程序化，例如“被牺牲者”的知情、时限、复

原、追责权利，与最小限制的证明，判据二则确立不可替代的人这一不可逾越的红线。

反对三、文化多元，何来普遍性？

回应：这里的“普遍化”是程序性的，任何人提出的规则，都必须能被所有潜在相关者作为共同法则来意愿；这是一种可共立法性测试，而非导出“唯一善的生活”。目的王国的设想正是为了在多元社会中把彼此视为共立法者来对待，而不是共享某个厚实的道德终点。

反对四：尊严的“不可替代性”过于抽象。

回应：奥尼尔等当代康德主义者已把它转译为可检验的同意/不欺骗不强迫与最小限制原则：凡使真实同意不可能的欺骗与胁迫，皆构成把人仅作手段的明证，因而应当被制度性排除。

由此可见，在后现代的多元与不确定中，康德的普遍化—尊严—相互立法可被重述为三条可操作的底线判据。它们并不要求共同体共享宏大的终极目的，却能同时纠偏两端，一方面，原子化的相对主义在普遍化检验中自我取消；另一方面，“牺牲叙事”被不可替代性与可公开辩护所设限。作为制度化的“目的王国”，社会成员在规范上彼此承认为共同立法者，而非工具或变量。必要性并不在于它提供全部德性的蓝图，而在于它确保任何追求效率与秩序的实践不越底线——这正是一个后现代社会所能、也所需的最低公共伦理。

参考文献

- [1] 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M].商务印书馆.
- [2] 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M].商务印书馆.
- [3] 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M].商务印书馆.
- [4] 杨国荣. 伦理的根基——康德伦理学研究[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5] 何兆武. 康德伦理学引论[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6] 王庆节. 康德的定言令式与道德法则[M]. 人民出版社.
- [7] 刘慈欣. 三体（三部曲）[M]. 重庆出版社/科幻世界·天涯版.
- [8] 郭帆（导演）. 流浪地球[EB/OL]. 中国大陆：北京文化等出品, 2019.
- [9] 罗尔斯, J. 政治自由主义[M]. 译林出版社.
- [10] 罗尔斯. 正义论[M]. 译林出版社.
- [11] 哈贝马斯, J.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 上海译文出版社.
- [12] 哈贝马斯. 事实与规范[M]. 法律出版社.
- [13] 霍耐特, A. 承认的斗争[M]. 商务印书馆.